

此文为美国波士顿大学科学哲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曹天予先生在1994年波士顿科学哲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科学与历史之间的现代与后现代图景

曹天予 著 胡新和 译

在当今的现代与后现代之争中，焦点已不再如后现代运动于本世纪六、七十年代首先在诸如建筑学、电影、舞蹈和音乐等领域崭露头角时那样，仅仅是美学趣味和艺术风格问题。这种争论关涉到道德思考和哲学思辨，但又不局限于此。如今，战场已转移到现代文化最后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堡垒，即科学。自从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起，科学的运用就成为一般公众和科学家自身道德审查的对象。而从50年代后期以来，对于科学的批评，已从对其使用或滥用的批评，拓展到对于其基本原则的批评，这种批评在美国由T. 库恩、H. 普特南和R. 罗蒂所代表，在法国则由乔杰·康吉昂(Canguihem)，M. 福柯和米歇尔·塞尔所代表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中的新潮流所助长。科学家们并没有为外来者的噪声所扰。直到80年代中，一种对于现代科学基础的严重挑战或所谓的后现代科学才得以出现，并以杰出的物理学家伊里亚·普里高津，约翰·惠勒，肯尼斯·威耳孙，菲利普·安德孙和霍华德·乔治为其英雄人物，以知名作家詹姆斯·格莱克和物理学家—历史学家西耳万·施温伯为其通俗化和哲学化作者。这就把现代与后现代之争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概念基础的层次上，在其全部的话语中，后现代科学的提倡者们致力于证明世界并非如大部分现代科学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为线性因果规律所支配的永久稳定的统一体，而是一个为根本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的涨落所支配的不均匀过程。他们论证说，作为现代性特征的现代科学方法的还原理性和工具理性，以及它所强调的理论、逻辑、客观性、预言和控制等等，应当为对于差异和复杂性的敏感性，为合理的怀疑论和对差异的宽容，以及对于实验、修辞学、参与性和适应性的强调所补充，或者甚至为之所取代；而那种把历史看作是朝向人类自身的实现和完善逐步进化过程的目的论观点，则应作为一种历史是征服与抵抗、竞争与适应之间多少有些彼此独立的过程演替的观点所取代。这一套语词对于现代科学基础的腐蚀性，在于它令人印象深刻地被包含在这一断言中，即这些立场是诸如混沌理论、有效场论(effective field theory)和生态学等学科中的最新发现的自然结论。

这样，后现代主义如今已成为对于现代科学基础如此严重的挑战，以致于为诸如斯蒂文·温伯格和杰拉尔德·霍耳顿这样现代文化的捍卫者所不能忽视。我预期在下面的发言中，他们都将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发起有力的反攻，从而把这场论战带到一个新的高度。而本文的目的则是相当简朴有度的，即详细说明我对于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变迁的蕴涵的理解，尤其要论及如此频繁地为后现代话语所抨击、而为正统的文化观念所痛惜的科学。

—

“现代性”一词有着其历史的和概念的所指。它指涉西方历史上不同于古代和中世纪的一个确定时期，也指涉不同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一种确定社会。一种多年来广泛流行的见解认为，现时代起始于现代科学的兴起，而现代社会是现代科学和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发展的结果。同时，它还宣称按照历史的基础、机制和因果说明而对于其所作的现代理解，是自然科学对于人文学科及其演变的投影。这就是现代图景从科学到历史的论点。这种论点十分流行，却经不起严格的审查。尽管从科学到历史的图景在现代化时期的后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被描述为现代化过程的深刻的社会—历史转型，即城市化、世俗化、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个体化等这样一些过程，在现代科学兴起之前就已经方兴未艾，并且又独立于科学继续发展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因此，正如S. E. 图尔明在其著作《国际都市》一书中所着力论证的，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内涵，要大于现代科学所包容的内容，不能被还原为后者。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人类事务的关心，与批判精神相谐调的合理的怀疑论，以及对歧见的宽容。

与现代图景的论点相对应的，是后现代图景中从历史到科学的反论点。这种论点认为，现代科学的理性特性和后现代科学的非理性特征，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的某些特征在有关物理世界学科上的投影。这一反论点确实具有一种启发性力量。然而，当现代主义者借助于这一论点以消解后现代科学的合理性时，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又争辩说，混沌理论、有效场论和生态学的本征特性都吸收了这些学科的内在发展，因而不能被指责为来自外部的投影。同样应当注意的是，来自这些理论的某些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有“不可还原的随机涨落”，“秩序出自混沌”和“突现”）的广泛传播，为后现代主义者提供了理解历史与社会的基本隐喻，并支持了他们关于偶然性、局域性和多元论的初始预设。

单向图景的论点的失败，要求探讨科学与历史之间关系的一种新的基础。来自一个领域的概念和论证经常被卓有成效地应用于阐明和为之另一领域中的立场辩护，这并非借助于强制性的逻辑，也决不会有这样的逻辑，而是由于有善于接纳的耳朵。我们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可以理解这种交互滋养的现象？现代与后现代之争的焦

点是什么？关于这一点，一个关键的概念是世界观。世界观是一种统一我们关于自然和人文观念的文化模型。因此，所有经济和政治的行动和制度，都必然渗透着世界观，并且由世界观来为之辩护。在这个意义上，每一种居统治地位的世界观都界定着和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自我认识。这就是说它提供了有关世界的基本秩序，以及人类在其中的地位等问题的答案。在历史上，在不同的时期，界定世界的功能是分别由形而上学，神学，或是科学来完成的。科学能起到界定世界的作用，是由于科学观念不仅明显地关涉自然现象，还总是具有一种隐含的意向，即对于世界及其人类在其中地位的终极图景，表达或提出一种具有概括性和综合性的看法。这种隐含的意向并非全然为科学的内在特性所支配，而是回应于来自外部的强制性需求的。在界定世界的层次上，解释性要求就是要提供假说以满足这种需求。借助于这些评论，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来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进行更为专门的探讨。

二

如果现代性的起始远早于现代科学的兴起，那么现代性何以能获得其诸如假说逻辑、经验检验、理性说明、反教条主义、宽容和进步等等主要的定义特性（它们作为科学和民主的理想模式，主要来自科学）呢？而科学自身起初又从何处获得这些特性呢？如所周知，传统社会的崩溃起始于文艺复兴，并为新教改革所加速。哥白尼革命，人类中心的宇宙秩序的瓦解，教会权威的衰落，导致了以埃拉默斯和蒙塔古为代表，以传统、教条主义和整个中世纪基督教制度为指向的普遍的怀疑主义。在这一前科学阶段，现代性被人文主义、批判精神和对于差异的宽容等特性所表征。

然而，改革和传统制度的迅速崩溃并非没有遭遇到阻力。其间爆发了广泛的宗教冲突，以及最为重要的、导致了经济衰退和社会动乱的1618—1648年的30年战争。而较早已丧失的关于伦理的、神学的和宇宙学的信念上的一致性，更强化了这样一种危机感：所有的一致性都已消失。这种世界的崩溃为普遍的怀疑、担忧和焦虑所伴随，而这种情绪又并非偶然地出现在笛卡儿著名的1619年之梦中，并被生动地描绘在其1641年的《沉思》中。当17世纪上半叶，欧洲的中心问题是致力于稳定，思想界的当务之急是为秩序寻求理论基础时，怀疑主义开始被看作是混乱的根源，而探求确定性则成为有吸引力的和至为迫切的，现代性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代性的思想基础是理性主义，按照这一理论，一个情感上和实践上都与外部世界相分离的纯粹主观理性，是所有认识的惟一的坚实基础，而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了作为一个稳定的、有序的、甚至是统一的世界客观表征的知识。

对于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者，就像对于英国的自然哲学家一样，理性的最终根源和保证首先在于神性智慧。对他们来说，自然规律不过是上帝创世的规律，而科学可以并已被证明为是达到一种神学目的的有效手段。然而，一些与之相竞争、并且经常是相冲突的对于《圣经》的说明，动摇了《圣经》作为神性智慧的权威文本的地位，新教也倾向于允许愈益从可观察现象中撤销其神圣的力量。其结果是理性的源泉逐渐地由上帝所支配的转变为由数学规律所支配的和谐的自然，而界定世界的功能则由宗教转交给科学。

作为现代世界观的核心，理性的特征在于其普遍性和批判性。在西方，伽利略和笛卡儿促成了理性事业的重心从法律和医学实践向研究力学现象的转移，其结果是由分析、还原和统一构成的因果推理的兴起。由于不允许有主观介入的特殊性，特别是由于为伽利略、笛卡儿和其他许多人所钟情的力学的数学化，因果推理的普遍性得以保证，并成为预言和控制的基础。另一方面，逻辑程序和客观性要求也赋予因果推理以一种批判性特征：没有可以被求助的外部权威能证明关于自然的信念。由此，科学的启蒙驱散了教条偏见所造成的束缚。

康德把笛卡儿在自然哲学中的理想拓展到伦理学，确立起纯粹理性的道德标准。按照这种标准，每个人都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这是一种新的文化价值模型，其中每一个体自我都起着一种终极要素的作用，一种类似于物理世界中的原子所起的作用。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集体人文主义为一种道德个体主义所取代，但后者也并非没有其批判性甚或革命性推动。对康德而言，政治只有表达了人民的意愿时才是理性的。因此，反对暴政的革命是可以辩护的，法国启蒙运动的社会理想，例如民主和参与等在康德伦理学中找到了哲学表述。康德或许是理性的启蒙力量的最坚定的信仰者，而黑格尔和马克思则清楚地认识到了限制着启蒙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并赞同康德的如下观点：人类历史表现出一种在获取普遍自由和解放上不可逆转的进步模式，朝向一个真正自由、正义和理性的社会发展。

因此，现代性在一种理性和进步的元话语中表达着自身，正是这种元话语为所有其它话语提供了合法性。这招致了来自不同视界的严厉批评。对于保守主义者而言，科学推理的合理性和个体主义蕴涵着道德基础的瓦解，他们认为这样的基础需要在神学的或公共的神秘信念中寻求，而现代性的命运只能是无止境的危机。另一种对于理性的悲观主义批评集中于其社会而不是道德方面。它辩称说，科学理性并不是个体化的或超验于自然的，而是必须被置之乎其情境之中的。这就是说历史地看，它不能与资本主义或极权主义及其病理学副作用区分开来。从这一视界来看，对于极端悲观主义者而言，理性在实践中实际上不仅按照有效管理规则服务于社会生活中的等级统治，而且通过强制性的一致、整合、压抑和控制而起作用。由此，理性成为作为资本主义和极权主义基础的统治力量。甚至对于理性的更为激烈的批评也不会超过尼采和弗洛伊德，他们旨在揭示理性形式下的前理性和非理性的内涵。例如，尼采证明理性不过是加强我们克服自然中的无意义混乱的权力的有效工具。这种观点得到了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及其本能动力学表述的支持，按这种表述，理性似乎总是服从于隐藏的侵略性驱动的效力。显然，作为理性观念基础的深层非理性动力学说的这一类揭示，已使得理性观念本身空无一物。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来自50年代初期，当奎因批评逻辑经验主义并引入整体论和概念的相对性时。这一批评为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自我批评和对语言的反思，以及库恩的革命性的科学史观点所增强。库恩观点的中心是其范式概念，作为历史发展的结果和科学探究的前提，这个概念把历史和概念的相对性引入了对科学的理解中。比库恩更为激进的是社会建构论者，他们把不同的社会维度引入对科学的理解，作为其决定性因素，从而反对纯粹的、自主的和非个人的科学理性这一概念本身。在欧洲大陆，一场为后结构主义者所发动的类似的攻击也在全面进行着。他们反对语言中心主义，或是通过追随尼采以权力关系作为我们阐释“事实”一词的决定性因素的观念，或是通过追随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按照这种理论，没有人能逃脱语言历史主义和意义的不确定性，从而掘空了任何有关知识、真理或理性断言的根基。

为所有这些批评所共有的信念，首先是科学没有坚实稳固的基础，其次是科学并非一种对于惰性世界的客观表征。一个表征预设了一种笛卡儿式的认知主体与其环境的分离，但人类作为主动行动者的这种本性，就蕴涵了认知主体和被认识的世界是内在地彼此渗透的。此外，由于物理学和数学的基础研究中诸如海森伯不确定性原理和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等发现，这些年来，人们对于科学依据其严密性和一致性而言的合法性所遭到的各种

内部侵蚀，也日益敏感起来。考虑到所有这些，怀疑论者论证说，科学无论是就道德目的、认知真理、或是逻辑一致性而言，都不再能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更不用说用其它话语了。科学，或是更一般地理性作为合法性话语的失败，导致了刻划现代性方案的元话语观念本身的瓦解。所有这些观点、论证和批评，构成了后现代性，尤其是后现代科学起始和被接纳的思想背景。

三

不同于指谓一个历史时期和一种社会的现代性，后现代性指的仅仅是一组文化现象。严格说来，即按照现今的商品和市场社会，以及在公众和私人生活中仍居统治地位的官僚政治理性，我们依然生活于一个现代性的世界中。对于思想确定性、数学精确性和逻辑严密性的现代追求，推动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从而铺平了获得经济和政治上的更为解放的道路，但也在深化着人类的失败，这种失败不仅见证于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的暴行，而且体现在自由民主中不断强化的一致、整合、压抑和控制。正因为这么一种悖谬的性质，人们对于现代社会的态度，依据他们在其中的位置而大不一样。总有些人要比主流人群更具批判性，并从中发展出某种实在观和实践观。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不过是现代性方案的延续，即一种借助于重新诉诸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智慧，来实现我们实在观念的自我修正和理性解放潜能的更充分的发挥。而另一些人出于政治原因，则主张不连续性，并设定了与现代性相对立的方案。如前所述，在对于实在的理解中，怀疑和非理性的种子在历史上至少自尼采和海德格尔以来已长期存在。而作为一种文化运动，后现代主义的新近起源则不早于60年代。

人所共知，西方60年代的激进主义，是对于战后的富足社会中那种崇尚技术秩序而令人压抑的一致性的回应，是对抗呆板沉闷的现代性社会，对抗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标准化、包括立足于工具理性和还原理性的普遍抽象的思想模式的反叛。60年代的反叛失败了，不满却存续下来。于是，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首先，西方经济的转型由于高技术和分散经营而增加了经济生活的多样性、灵活性和机动性；其次，诸如性解放、女性主义、环境保护、少数民族和其他边缘人群权利等等新的社会运动的兴起，也同样表明了社会变动性的增强和历史的加速。此外，由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复兴和共产主义对立面的消失，同样也由于福利政策的实施和社会权力的分散，在作为一种制度的经济制度内部，社会冲突似乎正在衰退。所有这些都使那些易于共鸣的人们联想到，一场与既往社会形式的决裂和对稳定性的颠覆已经发生，相对于阶级斗争或是相竞争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冷战，地域政治已占据首要地位。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中，对于现代性的激烈批判获得了新的势头，成为为边缘社会人群的权力和地位而作的文化斗争的一部分。

后现代主义者及其文化批判通过指出理性和作为一个永久统一体的世界概念在为压抑、霸权和控制提供合法性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为自己反对偶像崇拜的态度和政治意向而辩护，尽管作为现代性特征的个体主义和批判态度同样总是充斥着他们。那么，他们的新的实在观是什么呢？在这个方面，一个关键的概念是“突现”，按照这个概念，实体在某个层次上的性质和规律由于经由演变而产生的新奇性，或仅由于事物所拥有的性质不为其部分所拥有，所遵循的规律不为其部分所遵循，是不可由那些较低层次的性质和规律来预测的。从科学上讲，“突现”概念预设了世界的非线性本性和显著的二分，反对线性因果链和严格决定论的普遍性。它为起点多元性观念和原则多样性观念作了辩护，同时也在突现不存在的区域为局域决定论保留了空间。如果社会系统服从于突现，那么对于什么是中心和什么是边缘就不存在固定的方向性，历史作为一种带有直线方向的进步过程的目的论观点也不再站得住脚。如果物质系统服从于非预定性质和状态的突现，那么基础和统一就只能有一种很弱的意义，而还原性说明也受到限制，不再是普遍适用的。因此，为“突现”概念所拓展的文化空间是值得探索的。但问题首先是：用以辩护“突现”概念的是什么？

这里，后现代主义一反其通常的反科学的立场，大量地利用了科学的威望。人们或许会奇怪，如果科学只是一种真理的表达，而并非对于为艺术所主张的意境的表达，科学何以能是后现代的，何以能给后现代话语以支持？然而，这是可以论证的，因为科学研究总是在范式内进行的，而范式对于文化是相当敏感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混沌理论。混沌现象为人们所注意可谓年深月久了，但只是近来才成为时髦的研究课题。为什么会有这种延误呢？其原因可以说是非线性动力系统的研究为相对论和量子论的兴起所打断，为研究所需的复杂数学或是有效工具，例如计算机的缺乏所阻碍。然而，汹涌而来的混沌热确实与后现代主义对于混沌和秩序之源的敏感性相关。例如，作为这一领域里的英雄，伊里亚·普利高津明显赞同并引申了杰出的法国后现代主义者米歇尔·塞尔的观点，即混沌描述的并非迄今为止未曾认知的现象，而是一组被不正当地忽略了的价值，例如开放性，反排他性，多重视野，非均匀性，不可决定性，非线性等等，这些价值是与现代文化中秩序优先于创造性，观察优先于显现，或死亡优先于生命等方面体现出的那些线性价值观针锋相对的。普利高津的这种赞同正巧发生于他的广为流传的著作《从混沌到有序》发表之前，此书的书名业已成为后现代话语中最为传神的警句或基本隐喻。

在科学与修辞学之间的横断面上，有着三个来自混沌理论的概念：涨落，突现和不可预言性。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于1963年发现，在一个决定论的非线性系统中，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由于系统中连续的分岔，会出现不规则涨落，其中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会放大为极大规模的变化。不同尺度的涨落彼此相接，并可由重整化群的途径所追踪。在一个保守系统中，这有时会导致一固定点，它描述了凝聚态物理学中临界点上的定标或普适性，或是量子场论的重整化；在一个耗散系统中，这可能导致一个奇异吸引子，这种奇异吸引子是稳定的且不依赖于初始条件，它标志着一种其总体特性得自于对许多轨道或是很长时间取平均的新现象的开始。尽管可以把出现的新秩序看作是隐含于系统中的，但占压倒地位的观点是：在演变过程中出现的总体秩序是单个实体在混沌涨落中形成

模式或自组织的结果。按照这种观点，那种稳定的物质统一体的观念，以及基于这种统一体并通过直线因果链去预言宏观现象的努力都不再有意义。尽管不规则涨落在耗散系统中，并非如在热涨落或量子涨落的情形中那样是第一性的，然而作为随后的放大的必然结果，来自混沌的秩序的出现却确实标示了其涌动不可驾驭、其深邃不可测知的本质上不可控制的随机性的生命力。借助于后现代的敏感性，人们发现了愈来愈多的可运用混沌理论的耗散系统，从地质构造的潮汐活动、基因形态学、人口动力学和社会决策，直到开放市场中的消费选择。

此外，人们还注意到，得自于混沌理论的物理世界观念与那些表达于保守系统，例如量子场论的汉密尔顿系统中的观念有着深刻的类同。众所周知，在量子场论中，量子场在不同长度上的基础性剧烈涨落具有本体论上的首要性。它们彼此耦合，却不可预言和控制，并成为发散困难的最终根源。令人吃惊的是，正是由这种永久的骚动中出现的稳定的基本粒子系统，构成了我们的物质世界。除了为重整化群方程和固定点解所描述的系统的渐进行为外，还有着影响稳定系统出现的其他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自发对称性破缺现象，以及涉及重粒子，

尤其是与自发对称性破缺相联系的重粒子的从高能过程到低能过程的脱偶现象。一个首先为西尔万·施温伯提出，由这些观念联想产生的物理世界图景，是一个由类自主的层次区域形成的等级结构，其中每一层的本体论和动力学本质上都是类稳态的，它们不为其他层次的事件所影响，但可由一种有效场论所描述。

在标准模型的框架里，一个稳定的费密系统的突现特征，由下列事实最为清楚地表明：费密系统的自发对称性破缺不是为其自身的动力学结构所规定，而是由一级标量系统的对称性破缺，经由汤川耦合和规范耦合而引发的。这一对称性破缺的双重结构给标准模型带来了一个明显奇异的特征，即除了有理论上确定的用以说明和预言观察的部分外，还有一个可任意调节的部分，以作出对实际物理状态的现象学选择。但这种奇异仅当我们不得不从系统的基础去推演出可观察现象时才存在，而当我们认识到任何可观察的基本粒子系统都是突现的，因而是不可由基础结构的骚动中推演出来的，那么某种程度的现象学选择就是不可避免的，不那么奇异的。再者，与自发对称性破缺概念相联系的宇宙相变的观念也提示着自然规律的历史化，即在低温时的自然规律，例如那些为麦克斯韦方程或薛定谔方程所表达的规律，应当被看作是历史进程的产物。

另一个为后现代主义所欢呼的范畴，所谓的行为者的科学，选取了生态学而不是物理学作为其基本模型。在这一模型中，认知主体与对象相分离的观察概念，为主体的参与概念所取代，以强调认知活动的反馈性质和来自认知对象的回应。它包含了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也包含了量子理论，生物学和生态学。尽管在后一种情形中，反馈不是来自真正的行为者，而是来自物质世界，但关键在于这种来自对象的回应使分离的观察不再可能。这些参与的科学的一个伦理蕴涵，或许在于我们必须发展一种与实践相关的对于人文和自然的整体理解，使得科学家能与人文的其他部分重新结合，不再自命通过发现客观真理而拥有自我辩护的特权。

我们业已总结了后现代主义者关于科学的敏感性中的两个特征。其一，强调科学的历史的而不是逻辑的、整体的而不是分析的、定性的而不是定量的方面，最后一点强调意即不再追寻不可预言的微观细节，而致力于发现长程的和总体的模式。其二，是对于参与的强调，这确实提出了修正我们对于客观性概念的理解问题。当那些起源于当代科学的术语，例如非线性、分叉、涨落、突现和参与等，其隐含的价值内涵为后现代主义者所利用时，产生的多义性已远远偏离了科学话语的单义性目标。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甚至于在原初出现于其中的科学话语中也并非可严格定义的，更别说将其扩展至距其原初发源地如此遥远的文化、社会和历史领域了。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作为隐喻而非概念，它们能够传达一种新的实在观，并起到重要的组织原理的作用。

四

我们究竟应当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最新的时髦，还是看作代表了一种意义深远的文化变迁？回答这一问题关键在于从世界观构成的视野去考察这一现象。中世纪的教条主义和狂热与过渡阶段激发了文艺复兴中宗教宽容的需要；30年战争中的混乱情势使得人们期盼秩序和稳定性，并把现代性推进到其第二个阶段；而当代官僚政治社会令人窒息的僵化则把人民推向为变革而斗争，这已为60年代的激进主义和其后的后现代主义所证明。从这样的视野考察后现代主义，我们就会发现，在后现代主义者的许多琐屑表述的背后，有着一一种面对着旧的、令人生厌的世界基础的崩溃而对于新基础和新秩序的不懈追求。

塞尔曾论证说，来自混沌的随机自组织需要一种指向文化复兴、指向新的文化实践观的新物理学。他的这一措辞所指为何？他所希冀的暂时的存在，多元的实在，局域的因果性，合理的怀疑论，不反对可靠的知识，但反对教条的偏狭，以及灵敏的实验等。他认为所有这些都，必须有一个新的辞典来表示。对于文化复兴和这种新世界观的追求是通过后现代主义的隐喻的传播来表示的，这些隐喻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其字面含义，而在于深层期望的异化。如果我们认识到世界观的塑造世界的作用，那么当前文化变迁的潜在意义就不应被低估。

可以理解，有些后现代主义者出于策略原因，致力于以机械世界观和还原理性、工具理性为一方，以更为辩证的世界观和对于还原理性、工具理性更为批判的态度为另一方的二者之间的对比，即强调传统的现代性与一种正在突现的世界观之间的对比。然而，真正困难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保证当前时代的迫切需求能为后现代话语所正确表达？

在我看来，一个统一的现时代或现代世界，一个将要为后现代的时代或是世界所取代的后现代话语，是过分简单化了。如上所述，现代性其本性是悖谬的。只有借助于理性反思和实践，它的许多缺陷才能得以克服，它的许多潜能才能得以完全实现。后现代主义所宣称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不连续性，是站不住脚的夸张之辞，因为为最新科学发现和批判反思所提出的突现中的世界观，不过是现代性世界观的自我修正和逻辑结论。此外，对于官僚社会以及工具和还原理性的合理的不满，已经被60年代的许多激进分子，被80年代和90年代的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领上了错误的方向，即一个反科学和反理性主义的方向。在后现代主义的话语中，我们能找到许多难以接受的陈述，例如反对客观知识和指称意义，以及轻视同一性、统一性、稳定性、普遍性和因果性等，结果是面对为现代性追求所推进的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后现代话语对科学的理性不能给予令人信服的说明，从而显得非常有限，不能够远离校园，更别说到去动摇或是剧烈变革现代社会了。因此，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潜在意义，一个尝试性的结论是：只有当我们成功地摆脱了后现代话语中许多给人以误导的表述后，我们才能正确地把握经常与这一话语混合在一起，或是埋藏在一起的当代文化转型的深刻蕴涵。

(Tianyu Cao, "Modern and Postmodern Mapping between Science and History", 责任编辑: 张小简)

[回主页](#)